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农业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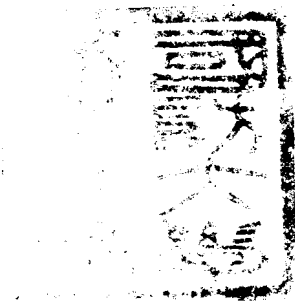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农业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1

(京)新登字028号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农业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32印张 829千字

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

ISBN 7-80050-236-8/F·25 定价：17.80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编辑委员会

| | | | |
|-----|-----------|-----|-----|
| 顾问 | 薛暮桥 | | |
| 主编 | 刘国光 | 王明哲 | |
| 副主编 | 董志凯 | 陈廷煊 | 张景堂 |
| | 刘美玲 | | |
| 编委 | (按姓氏笔划排列) | | |
| | 于渝生 | 王礼琦 | 王明哲 |
| | 朱文强 | 刘国光 | 刘美玲 |
| | 陈廷煊 | 李光田 | 李志宁 |
| | 张志 | 张景堂 | 武力 |
| | 董志凯 | 赵增延 | 韩志宇 |
| | 谢玉叶 | | |

总 序

刘 国 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已经整整四十个春秋。

四十年来，中国人民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备尝创业的艰难，失误的痛苦和成功的欢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使落后的农业大国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并正向着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面临新的世界性的现代化竞争的挑战，我们必须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国内外一切先进思想理论、管理经验、科学技术成果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必须谙熟国情，了解自己，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尤其需要系统、深入、有创见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而广泛地、翔实地占有中国现代经济史料，包括四十年来有关中国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效益的统计、文书等档案资料，则是为学术理论大厦奠基和建设实践征途铺路的基础工作。

新中国的创业者和建设者们，以卓绝的智慧和劳动，

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档案、资料书刊。然而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这些珍贵文献长期以来被束之高阁,难以发挥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促使档案部门和专业科研人员携起手来,共同编辑出版经济档案资料。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有可能建立在一个扎实坚固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就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是一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料的大型学术资料系列丛书。它既是资料性的,也是学术性的。说它是资料性的,因为书中正文内容全部采用原始的档案资料,在编辑过程中严格维护文献原意,对重要文献资料力求兼容并蓄,毋使遗漏,并且为读者进一步刻入探索提供详尽准确的来源和出处。说它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是编者对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按照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演变、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等方面分门别类,设立卷次,详列纲目,按类编排的。在编排的过程中注意到历史和逻辑的结合,每一卷资料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比较分析和研究,而不同于一般的文件汇编。这部学术资料书还具有探索性的特点,它对于浩繁的新中国的经济档案资料所进行的全面系统的整理,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可以说是一种开拓性的尝试。

这部系列丛书是协作的成果,除了中央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通力协作外,还得到国务院、国家各部委档案部门的热忱支持,并承蒙当年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老同志

的谆谆指教，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谢意。

由于这部系列丛书的编辑是一种新的尝试，加之档案资料的分散和统计资料（特别是建国初期的）的不完备，编辑工作必然有诸多不足和不尽人意之处，敬请读者提出批评建议，以便再版时改进。

凡 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一部大型经济学术资料工具书，编辑的目的是为经济领导部门、经济工作者和从事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学等方面的人员提供比较系统全面的经济档案资料。

二、本丛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顺序编排。第一批为1949—1952年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资料。全书力求全面系统地收集选录1949—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有关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演变以及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等经济运行诸环节的主要档案资料，反映该时期我国经济生活方面的基本情况。

三、全书按专题立卷，包括综合、工商体制、工业、农业、交通邮电、商业、外贸、基本建设投资、财政、金融、劳动工资、物资等卷。

四、部分卷的内容间有交叉，但从各卷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五、各卷的结构大体一致，一般采用纲、目、子目三个层次，按“第×部分”、“一、二、三”、“(一)、(二)、(三)”排列，部分纲目设立分子目。多数卷写有《前言》，编有《附录》。

六、由于按专题立卷设纲目，并为确保材料精炼，增加信息容量，对档案资料大部分采用节录、摘录处理。凡录用主要内容者题目在文前，出处在文后；凡局部采用者，题目、出处在文后。为便于读者了解档案资料原貌，尽可能整段选编，并对删节之处注明〔上略〕、〔中略〕、〔下略〕。对部分人名、事件资料及已变更

的地名，在页下加以简要注释，当页编码。在每个子目之中，资料一般按时间顺序排列，并照顾事件、逻辑相关联者放在一起，以便查阅。

七、凡属编者加在行文中间的文字，均加〔 〕号；凡为讹误字，在该字后面加〔? 〕号；残缺或模糊难辨的字，用□号表示。

八、各种资料标题下的日期以及资料出处的日期一律使用公元，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资料中的年代日期和数字，一仍其旧。

九、1955年3月1日我国币值改变前的资料中的货币单位，一律为旧币，10000元相当于1955年3月1日改变后的1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本书个别采用新币为单位的资料，均在页下加注说明。

十、资料出处置于该件资料之后。为节省文字起见，档案资料出处以字母和数码代之，首为档案资料保存单位，次为档案资料分类编号，括号内为资料书的年号、卷次等。书后附部分资料书目索引。

前 言

(一)

本书编辑了1949—1952年间，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业生产方面的档案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9.4%；农业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70%；农业净产值占工农业净产值的84.5%；农村经济因受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和长期战争的破坏，生产凋敝，交通梗阻，贸易滞塞、物价飞涨，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农业生产因战争破坏而下降，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动力耕畜比抗日战争以前减少16%；主要农具减少30%；江河滨湖堤岸常年失修，森林草原植被破坏，自然灾害加重，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许多地区耕地荒芜，农业耕作粗放、施肥量减少，土地生产率下降。1949年与抗日战争前最高产量比较：粮食生产量下降24.5%；棉花产量下降47.6%；油料作物下降60%以上；桑蚕茧下降86%；茶叶下降82%；生猪年末存栏数下降26.5%；羊下降32.3%；水产品下降30%。1949年我国人均粮食448斤，棉花1.64斤，广大农民处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难之中。因此，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经济复苏和活跃起来，成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头等重要问题。

(二)

在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政府根据《共同纲

领》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与此同时，人民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政策：

1. 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确定地权，颁布土地证，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由农民自由经营、自由处理，以鼓励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消灭地主经济，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个体所有制，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保护和鼓励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是巩固和发展土地改革的成果，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人民政府在提倡生产上有困难的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解决个体农民生产中的困难的同时，允许农民自由雇工和雇佣劳动的自由；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2. 在流通领域，发展城乡交流、活跃农村市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建国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破坏；水陆交通梗阻，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农副产品特别是农村土特产品购销脱节，严重影响农民发展土特产品生产的积极性。因此，恢复和发展农村商品交换渠道就成为农村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决定环节之一。人民政府在提倡和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的同时，保护农民自由贸易，保护和鼓励私人商贩从事农副产品，特别是农村土特产品的购销的自由；在提倡农村信用合作的同时，保护农村私人借贷自由，以活跃农村经济。通过上述政策搞活流通，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3. 抗灾救灾政策。建国初期，各地水旱灾害严重，1949年全国受灾面积12,000多万亩，受灾灾民达4549万余人。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摧残。人民政府在灾区及时发放救济粮、发放救济贷款，解救灾民的燃眉之急，同时实行以工代赈、扶助灾民生产自救，就成为灾区农民恢复农业生产的关键。

4. 实行促进农业生产的农业税政策。改变过去的摊派为依率计征，对善于经营、勤劳耕作和改良技术而超过常年应产量者，

其超过部分，不增加税收，因急于耕作，其产量不及常年应产量者，其应交公粮不予减少。

5. 实行有利于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价格政策。在稳定和缩小工农业产品比价剪刀差的同时，制定粮棉、粮烟、粮麻等合理比价，以促进工业原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6. 逐年增加对农林水利事业的投资和贷款。1950年投资合24.49亿斤粮食；1951年投资43,460多万元，1952年增加为856,405万元。对农业贷款数额逐年增加：1950年农业贷款折合新币21,241万元，1951年增加为40,147万元；1952年更增加为107,627万元。

7. 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总结推广农民的丰产经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主义热情，人民政府因势利导，引导农民把爱国主义热情与发展生产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通过竞赛、检查评比、学习和总结推广农业丰产典型经验，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互相交织的物质能量转化的生产，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科学地综合利用土地、种子、肥料、水利、耕畜、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促进农作物生长。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人民政府在实行以上各项政策的同时，主要采取以下几项增产技术措施和途径：

第一、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人民政府在建国初期财政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农田水利工程，1950年政府用在水利建设上的经费相当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经费最多一年的18倍，1951年增加到42倍，1952年再上升为52倍。三年中对全国4.2万多公里的江河堤防的绝大部分进行了整修和加固。对一些水灾比较严重的河流，如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开始进行全流域的治理，对黄河长江也进行了一些有效的防御性工程。水利工程所完成的土方达17

亿立方以上，等于开凿十条巴拿马运河或23条苏伊士运河所完成的土方。全国有重点地兴修了大型农田水利灌溉工程358处，各地还因地制宜地举办群众性的农田水利灌溉事业，新建和整修的小型渠道和蓄水池堰共336万余处，新凿和修复水井共66.8万眼。增加机械灌溉排水工具117,500万马力，铁轮水车34.9万辆。三年中，全国共扩大灌溉面积4950余万亩，另有18,400万亩农田因增加和改善了水的供应而免于旱灾的威胁。据粗略估计，由于兴修水利，防止水灾和增加灌溉面积而增产的粮食当以数百万吨计。

第二、土地利用。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和政府倡导，三年中开垦了大量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15,056万亩，1952年同1949年相比耕地面积增长10.25%。三年中，增加水田面积4553万亩，增长了13.3%。在耕地面积增加的同时，农作物播种面积有了更快的增长，从而提高了复种指数。三年中，粮食、棉花、油料三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27468万亩，1952年比1949年增长15.7%。在土壤改良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例如，黄泛区的土壤的改良和利用；北方盐碱地的改良，南方红壤土地的改良；西北黄土区及沙漠风蚀区等地的水土保持等等。在增施肥料提高土壤肥力方面，政府实行“以农家肥为主商品肥为辅”的方针，发动农民广辟肥源，多养猪，多积肥，积肥与爱国卫生运动相结合，以增加农家肥来源。三年中，全国施肥面积增加15%，施肥量增加30%。商业部门增加了化学肥料的供应，由1951年的13万吨，增加到1952年的29.5万吨；油饼肥也有显著增加，1952年供应油饼肥222.1万吨，超过1951年供应总数的188.5%。

第三、农作物品种改良和良种推广。中央农业部制定了五年普及良种的计划和农作物品种改良及繁殖、推广制度。各地广泛建立专区，县示范农场，进行良种选育、繁殖工作。在普通开展群众性的选种、换种，评选优良品种的基础上，由示范农场组织当地乡农业技术人员对适合当地农业生态环境的优良品种进行

评选、就地繁殖，就地推广。到1952年，粮食作物的优良品种已经推广播种达1.2亿多亩。棉花优良品种已经占全部棉花播种面积的50%以上。

第四、农作物耕作技术和栽培技术的改良。人民政府实行农业科学技术和农民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广大农业科学技术人员深入农村，总结各地农业劳动模范的丰产经验，即从深耕整地育种播种、到中耕、施肥、灌溉、防治病虫害等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经验。在总结丰产经验的基础上，中央农业部颁布了《水稻丰产技术指导纲要》，《冬小麦丰产技术试行纲要》，《棉花丰产技术指导纲要》等等。这些丰产技术指导纲要的实施，对指导农民精耕细作，全面系统地改进耕作和栽培技术，从而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些技术指导纲要既是对各种农作物精耕细作的传统经验的系统总结，又是传统经验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密切结合，也是各种单项耕作、栽培技术与综合技术的有机结合，它符合农业生态发展的规律，因而能够获得增产增收的效果。

第五、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人民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及早预防，防重于治的方针，在全国各地建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站120个，三年中共动员12,000多万农民群众在54000多万亩耕地上进行了病虫害防治。建国初期，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一带的蝗虫为害极其严重，各地发动群众采取“改治并举”的办法，一方面用人工围歼扑打与药剂防治相结合的办法进行防治，另一方面，结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排除洼地积水，削高填洼，平整土地，铲除杂草、消灭蝗卵滋生之源，使千年蝗害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其他如水稻螟虫、小麦吸浆虫和锈病、棉花病虫害的防治，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减轻了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所造成的损失。据当时估计，约减少农作物产量损失折合粮食达到300亿斤以上。

第六、增补、改良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先进的耕作技术和

栽培技术，有赖于农具的改良和新式农具的使用和推广。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发动农民实行以增补旧式农具为主，有重点地推广新式农具的方针。三年中，共推广新式农具34.9万部。新式农具耕地深，盖土严，有利于消灭杂草、病虫，具有保持或形成土壤团粒结构的良好作用，可以增进土壤肥力。同时，由于新式农具工作效率高，节省劳动力，在农忙季节，可以及时耕种，不误农时，农作物出苗整齐，因而能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据东北区六个农业试验场和60多个互助组的材料，使用新式农具平均增产25%左右。

由于长期战争破坏，水陆交通梗阻，农村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村土特产品购销脱节，在交通不便的广大农村发生谷贱伤农。农民手里的农副土特产品卖不出去，就无法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无法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而农民只有通过出售自己的产品取得货币收入，才能购置生产资料，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恢复和扩大生产。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政府还在恢复和发展农村商品交换渠道，扩大农副产品购销等方面，采取许多具体措施：

1. 恢复和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以开辟新的商业渠道。除恢复和发展火车、汽车、轮船等现代运输之外，还广泛发展木船、大车、板车小推车以及马驮肩挑等运输，恢复从前的运输公司，使零担土产集中装卸，利于土特产品购销。

2. 为了发展城乡交流，扩大农副业土特产品推销，国营商业增设土特产公司，供销合作社设立专营土特产机构，开展土特产购销业务；同时鼓励私商下乡采购和贩运土特产品，并保障他们的合理的利润。

3. 召开各级土产交流会，举办以销售为主的土产展销会，恢复和发展农村集市、庙会，组织农民开展短距离的物资交流，建立贸易货栈和农民交易所、农民服务部，以方便农民出售土特产品。

4. 银行增加贸易贷款,支持商业部门对农村土特产品的购销业务。三年中,人民银行对贸易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80%以上。

通过以上措施,发展城乡物资交流,扩大了农副土特产品的推销,增加了农民的货币收入,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三)

上述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使农业生产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271.8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提高到1952年的417亿元,增长53.4%,年平均增长15.33%。

农作物业产值由1949年的224.3亿元,提高到1952年的346.6亿元,增长54.5%,年平均增长15.61%;农作物业中,粮食总产量1952年达到3278.3亿斤,比1949年的2263.6亿斤增长44.5%,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产量(1936年)9.3%。平均每人占有粮食从1949年的418斤上升到1952年的570斤,增长36%。

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同时,工业原料作物得到更快的发展: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8万担,上升为1952年的2607.4万担,增长193.4%,超过历史上最高年产量53.6%。油料作物总产量从1949年5127万担,上升为1952年的8386.3万担,增长63.6%;黄红麻总产量从1949年的73.7万担,上升为1952年的611万担,增长729%。其他农作物总产量1952年与1949年相比,甘蔗增长169.3%,甜菜增长151.1%,烤烟增长415%,桑蚕茧增长101.4%,柞蚕茧增长413%,茶叶增长100.7%。上述工业原料作物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以这些作物为原料的纺织工业、轻工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三年中,林业产值增长81.2%,全国累计造林面积2561万亩,其中

用材林887.2万亩，防护林1294.8万亩。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建设用木材。畜牧业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长42.1%。大牲畜年末存栏头数从1949年的6,002万头上升为1952年的7646万头，增长27.4%。猪年末存栏数从1949年的5775万头，上升为1952年的8977万头，增长55.4%。羊年末存栏数从1949年的4235万只上升为1952年的6178万只，增长45.9%。渔业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长116.7%，全国水产品总产量由1949年的44.8万吨，上升为1952年的166.63万吨，增长2.7倍。副业产值增长57.7%。

在农、林、牧、副、渔业全面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生活也得到初步的改善。1952年与1950年相比，农民留用粮食数量增长26.4%，其中生产用粮数量增长30.9%，生活用粮1952年比历史上最高年份（1936年）增长27.8%。1952年每人平均生活用粮食数量496斤。比历史上最高年（1936年）453斤增长9.5%。农民货币收入有了显著的增长，1952年农民净货币收入比1949年增长86.7%，每人平均净货币收入增长79.8%。农民对消费品的购买力增长近80%，平均每人消费品购买力增长73%。由于农民收入增加，广大贫苦农民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许多贫农上升为中农，整个农村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

（四）

本卷在纲目设置和资料选择编辑上，力求体现这个时期农业生产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发展进程的统一。第一部分，建国前的农业状况，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起点。第二、三两部分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技术措施和途径。由于农田水利建设对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第四部分选编了有关的资料。农业生产包括农作物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部门，每一部门又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生产项目，内容丰富多样，因此，第五部分农、林、牧、渔各部门恢复和发展的状况的篇幅约占全书总量的1/3。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